

导论 我国大学正在实现新的文化觉醒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淀和创造了以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国先秦时期以“立德树人，亲民济世”为核心和以“人文化成”为精髓的“大学之道”是我国大学发展、变革的“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大学曾经长期处于“象牙塔”之内，一直坚守“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准则和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注重发展人的理性”为宗旨的“自由教育”思想。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20世纪初“从科举到学堂”和“从20世纪40年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到20世纪80年代‘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新文化观”，我国教育领域已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划时代教育变革，效法西方为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深刻转变，为40多年来当代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智力支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世界范围内和我国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实质是一种“道德信仰危机”，日益引起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这个新的严峻挑战，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悄然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其核心是一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深刻揭示我国大学精神衰微现象的突出表现及其出现的众多根源，大力提高文化自觉，包括使命自觉、理论自觉、道路自觉和信仰自觉，探索创新“当代中国大学之道”的核心价值信念，以“社会转型与精神重建”为主线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学文化，在回顾总结中国大学百年文化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探索创立中国大学文化学科和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为追寻和认知“当代中国大学理想”开辟道路。

一、“人文化成”是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精髓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且长盛不衰，就在于它有伟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自汉武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大决策以后，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以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为核心的，它后来虽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经变迁，但是，作为孔子儒学的精华——“贵仁”和“重礼”却是一以贯之的，它长期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培育着它的人民和精英，并且造就了中华民族辉煌过去。

我国先秦时期《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后人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称为“三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八条目”。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先生的注释是：“大学的宗旨，在于彰明、发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并且努力达到‘尽可能尽善尽美的境界’。”并把《大学》列为“四书”之首。

经过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我认为，“立德树人，亲民济世”是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核心，“人文化成”是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精髓。“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特别是通过“修身”促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和治国安邦的人才，这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亲民济世”的基本要求是通过亲近、服务和引导人民，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动社会不断地延续和发展，这是我国传统教育的根本目的。“人文化成”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易经·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精髓，基本要求是通过人文化成“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也就是通过“人文化成”潜移默化地教化人、熏陶人和引领人，在通晓儒学经典的基础上把庶民教化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 and 治国安邦的人才，目的是以天下为己任，通过“齐家、治国、平天下”建设文明昌盛的社会。随之，我国先秦时期的“大学”成了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才养成的重要基地。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载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1941年4月）一文中对我国先秦时期“大学之道”的深刻哲理

和现代价值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思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过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一解》之所为作也。”

二、“象牙塔”是古希腊以来西方大学精神永恒的象征

早期的西方大学曾经长期处于“象牙塔”之内，远离社会从事传授知识的教学活动和纯科学研究，其基本精神是恪守古希腊“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准则和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注重发展人的理性”为宗旨的“自由教育”思想，其哲学基础是柏拉图作出的“‘有理性’是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的科学论断。欧洲中世纪以后，高深知识及其构成的学科成了大学的细胞和承载大学职能的基础平台。作为一个“学者行会”，通过向教会和世俗王权斗争得到诸多权利，终于确立了“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学者中立”的著名原则，促使大学成为学者们自由地追求学术、探讨高深学问和进行精神自由交流的场所。随之，西方中世纪大学被赞誉为人类文明的家园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随着理性逐渐成为人类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认识论基础，自然科学逐渐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18世纪中叶以蒸汽技术为主要内涵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以后，面对自然科学发展的严峻挑战，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英国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约翰·亨利·纽曼坚守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注重发展人的理性”为宗旨的“自由教育”思想，他的演说集1873年正式出版时定名为《大学的理想》，是西方第一本系统论述“以古典人文主义为主导的”大学理想的学术专著，在西方高等教育学术界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与英国的纽曼不同，德国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威廉·冯·洪堡顺应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以1810年柏林大学的创立为标志，把学术研究功能引入了大学，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和“由科学而达至修养”两条著名原则。从此，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活动正式进入大学这个知识殿堂，开启了西方大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新纪元。

19世纪中叶，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面对先后出现的以电气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要内涵的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随着西方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社会逐渐向“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社会的成功转型，人文学科由于其非生产性、非营利性和非直接应用性，它在社会文化形态和大学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现代科学技术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应该充分肯定，近代以来西方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是有力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延续发展。但是，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大学教育明显地出现了过度技术化的倾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面对这个新的挑战，1946年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的演讲集《大学的使命》（徐小洲、陈军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在深刻剖析西班牙和欧洲大学教育存在的严重弊端的基础上，严格区分文化、科学、专业三者之间的深刻联系和质的区别，鲜明地提出“通过‘文化的传授’加强基本文化修养教育是‘大学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基本功能’”，强烈呼吁对西班牙和欧洲大学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西班牙加塞特的主张并没有能够阻挡住西方大学教育“注重科技，忽视人文”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美国大学逐渐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之中，面对既要积极应对现实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又要坚守大学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学术价值的两难选择，1978年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的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和以“认识论哲学”为主导提出了“二十世纪‘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随之，美国大学进一步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和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继英国教化型学院和德国研究性大学之后，成为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中心。

张祥云教授的学术专著《大学教育回归人文之蕴》（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深刻地指出：“约翰·S.布鲁贝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到19世纪法国作家圣伯夫把大学称为‘象牙塔’”，“‘象牙塔’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象征’，圣伯夫想借用‘象牙塔’来形象地揭示出大学作为‘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有机体’的主要特点。”“‘象牙塔’的精神实质”，“就是秉承于古希腊‘知识即目的’的理性追求和中世纪的宗教信仰，把研究‘高深学问’视为一种崇高的生活方式”，“恪守‘为科学而科学’的价值准则，崇尚‘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的学者人格，自觉地维护大学作为‘社会良心’之神圣殿堂的不屈精神。”“走出‘象牙塔’并不意味着放弃‘象牙塔’的精神实质，‘象牙塔’的精神理念依然是当代大学的核心和灵魂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走

出’非但不在于‘放弃’，而是在于更好地‘护卫’并更有效地实现其价值，‘护卫’与‘走出’共同构成我们时代大学改革和发展的命运”。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在“文化”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1898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庄严地立下了“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伟大誓言。接着，1924年他又在创建广东大学时高瞻远瞩地发出了“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的伟大号召。为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立下的伟大誓言和发出的伟大号召，1932年11月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就职演说》（载于《南京大学办学理念治校方略》，冒荣、王运来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中鲜明地提出把“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中央大学的使命。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自立图存的根本

“一个民族要能自立图存，必须具备自己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如果缺乏这种文化，其国家必定缺乏生命的质素，其民族必然要被淘汰。一个民族形式上的灭亡，不过是最后的结局，必定是由于某种文化和民族精神先告衰亡。”

第二，民族振兴的关键在于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

“今日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社会的腐败，而最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个民族精神的文化。若是一个民族能重新建立起自身的文化，则虽经重大的危险，非常的残破，也终究可以复兴。积极的成例，就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普法战争以前的德意志民族”，“其具体的表现便是威廉·冯·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代表着当时德意志民族的灵魂，使全德意志民族在柏林大学所创造的一个民族文化之下潜移默化地成为一个有机体的组织。”

第三，创立民族新文化的使命大学责无旁贷

“民族文化乃是民族精神的表现；而民族文化之寄托，当然以国立大学为最重要。”“可见创立民族新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担负起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别人取而代之。”

第四，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素

“现在，中国的国难严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经到生死关头，我们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于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这个使命，我觉得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讲到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我们不得不特别提到其最重要的两点含义：第一，大家必须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今后要使中国成为有组织的国家，便要赶快创立起有组织的民族文化，也就是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从孙中山先生立下的伟大誓言和发出的伟大号召以及罗家伦的《就职演说》中，我们不仅为他们当时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所折服，而且更加确信了这一理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在“文化”。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灾难深重，中华民族之所以到了最危险的关头，并不仅仅是由于政治、社会的腐败，也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向西方学习制造“坚船利炮”上。最根本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和意识形态已经远远落后于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只有“把世界文化迎头赶上去”，才能“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

四、中西两种大学精神文化的矛盾冲突和初步融合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随着甲午战争硝烟的散去，人们看到在北洋水师旌旗折断的地方，1895年10月2日升起了一面“兴学强国”的大旗，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诞生了。这是中华民族不屈于外侮进行的又一次新的探索，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向近代转换的新纪元。

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迫于内外种种压力，1905年晚清政府作出了“废科举，兴学堂”的重大决策，开启了近代以来我国教育领域第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划时代教育变革。在这场伟大变革中，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和竺可桢为杰出代表的我国新一代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和教育家们高举“教育救国”的伟大旗帜，在近代中国广泛传播以“注重理性，崇尚学术，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为核心的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初步融合，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之于北京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于清华大学、“允公允能，服务中国”之于南开大学和“求是之光，海上灯塔”之于浙江大学，为在我国建立和发展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是在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形成和坚守“刚毅坚卓，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关注社会”的联大精神，成为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大学史上一座真正的丰碑。但是，陈平原教授在《中国大学百年》（载于《中国大学十讲》，陈平原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一文中尖锐地指出：“今日中国之现代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国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这其实正是本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承继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及其在解放区进行教育改革试验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遵循教育工作的普遍规律，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开启了近代以来我国教育领域第二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划时代教育变革，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和体系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20世纪80年代从“拨乱反正”到“三个面向”，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高等教育快速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推进了科技创新、文化繁荣，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民生改善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深刻转变，却重蹈了教育与权力不分的覆辙。我国学者熊丙奇教授在《体制化：大学最深刻的危机》（载于《科学时报》，2007年4月3日）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大学行政化问题已经深入我国今日大学的骨髓，而体制化是当前我国大学发展面临的最深刻的危机”。“中国高等教育要发展，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大学体制化问题”。

杨适教授的学术专著《中西人伦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深刻地指出：“文化的中心在人，文化理论的中心在人伦。”“如果说中国人的显著特点是宗法人伦的话，那么西方人的显著特征就是自由文化。”“应当说，这两种‘人伦’在人类历史上都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又都扭曲了人的整体性或人的个性”，“根本出路是寻求二者的相互融合”。“从文化上看，一种新的人类整体与个人的正常全面丰富关系将有可能建立”，“这是中西人类的共同任务。中国虽然现在从总体上说还落后于西方，但是，中国人民正在积极倡导‘和谐人伦’，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与世界

人民一道建设‘和谐世界’。我坚信，通过这场伟大的斗争，我国完全有可能为世界文化的进步事业作出特殊的贡献”。

五、大学精神衰微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在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长和人们生活显著改善的同时，我国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道德信仰危机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引起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经过初步分析，当前在我国出现的这种大学精神衰微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教育活动价值的缺失

长期以来，在我国人才培养工作中一直存在着重政治方向轻如何做人、重社会需要轻个性发展、重知识传授轻人文养成和重规范轻创新的倾向。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实现和教育消费市场的迅速建立，育人为本和教育质量没有得到有效的保证，在大学毕业生中甚至出现了“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的“单面人”现象。肖雪慧教授在《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载于《中国问题》，李静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中国教育的问题，可以说与我国教育价值理念的狭隘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狭隘性首先表现为把教育的价值确定在国家、社会这一环，而忽视个人与人类整体这两端。”“狭隘性的另一突出表现是排斥教育的超功利意义，而把教育的价值定位于纯功利性方面。”

第二，大学办学目标的功利化倾向

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学办学中一直存在着重当前轻长远、重科技轻人文、重知识应用轻求真创造和重服务轻引领的倾向。随着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创新意识和独立精神虽然有所调动，但是，大学仍然缺乏学术自由和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活力，创造力明显不足，有些大学盲目地跟着市场走，办学目标功利化倾向越来越突出。我国学者杨东平教授在《重温大学精神》（载于《大学精神》，杨东平编，辽海出版社，2000年1月）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中国大学精神的发育和大学制度的形成，有着与西方国家很不相同的情景和路径。一方面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自晚清洋务运动，是从发展军事和工业的实际功

利出发和主要由政府推动，具有浓厚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背景”；“另一方面，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自由主义的大学精神渐为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挤压”。“和世界大学相比，当前中国大学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十分独特的。大学里同时运行着官、学、商三种功能、目标完全不同的机制，大楼多于大师，设备多于人才，仍是普遍的事实”，“商业化的侵蚀和对教育的扭曲已经触目惊心”。

第三，行政化教育体制影响深刻

由于行政化教育体制的影响，加上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坚持高度集中的高等教育领导管理体制，大学领导和大学地位直接与行政级别挂钩，大学内部运行机制日益行政化，大学缺乏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活力。加拿大学者徐美德的学术专著《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许洁英主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2月）深刻地指出：“欧洲大学最根本的学术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自治权和学术自由。”“在悠久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呈现出一种与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学术价值体系。”

第四，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育、学术腐败现象

杨玉良院士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访问时尖锐地指出，“‘精神虚脱’创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发人深省。他说：“现在我国大学缺的是精神，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追求时髦。”“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脊梁，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有非常强烈的责任感。”“现在‘学术至上’的精神坚持得不够，应该有一批人‘为学术而学术’。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当前对我国大学来讲，回归和坚守，比改革更重要，回归大学应该担负的使命，回到大学应有的状态。”“20年后中国不得不扮演负责任的强国的角色，要有这么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又有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容忍和宽容，还有专业基础，这样的人在今后的各种领域里面，才能成为领袖。”（摘自2010年6月22日《中国青年报》网站）

六、时代呼唤我国大学实现新的文化觉醒

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悄然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其核心是一股大学精神研究热潮，首当其冲的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深刻挖掘我国出现如此严重的大学精

神衰微现象的众多根源。主要是：

第一，近代以来我国对封建文化革新的缺失

王长乐教授在《大学问题的深层原因是文化革新缺失》（载于《科学网》，2008年4月8日）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由于我国曾经经历过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因而封建文化的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我国社会在整体上正式对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运动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然而，相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滞后，而且在运动的深度上也远远没有达到民智启蒙及文化革新的目标。”“这种文化对教育，尤其是对大学的影响深刻而复杂。”

第二，忽视“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张楚廷教授的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以“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其核心就在‘人’，在寻求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其核心就在人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不再被异化”的精辟论断为指导，对1978年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以“认识论哲学”为主导的“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提出了质疑，强烈要求回归“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把“生命论哲学”作为高等教育赖以合法存在的主要哲学基础，深刻地指出：“把高等教育哲学主要植于认识论哲学基础之上，显然是偏向于用理性主义解释了高等教育的本性。”“然而，我们提出了多方面事实，从而也多方面地阐明了，对于高等教育哲学，不能仅仅归结为政治论和认识论那两种哲学基础之上。”“生命论哲学不仅涉及教育的本性、基础，而且涉及它的功能，不仅涉及其历史，也涉及今天”，“相信有了人，才开始了教育的历史”。

第三，我国社会正在转型产生的影响

张应强教授在《现代大学精神的批判与重建》（载于《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张应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个人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时，我们必然要用工业文明中的理性和市场经济的自由自主意识来取代农耕文明社会的依附性，逐渐走向具有独立人格和个体主体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深入发展，在‘工具理性主义文化全面包围’下，我们又面临着‘个人主体性’意识膨胀，特别是个人占有性主体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危险”。

第四，大学自身缺乏高度的文化自觉

睢依凡教授在《大学庸俗化批判》（载于《大学的使命与责任》，睢依凡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一文中冷静地指出：“尽管政治和市场是构成大学发展变化的重要影响力，但是，来自大学自身力量对大学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是绝对不能低估的，因为市场和政府只是影响大学发生变化的外因，对大学最后如何变化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即大学自身。同理，大学庸俗化的根源必须从其内部来找。”“如果大学是自省的、自重的、自律的”，“大学庸俗化还能有滋生的土壤吗？”

2011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决定》的颁布，深刻地指明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进行大学精神重建的根本方向。

七、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

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特别是大学精神研究热潮在我国的深入发展，我越来越深刻地感悟到：对于当代中国大学来说，面对当前我国出现的大学精神衰微，其实质是一种道德信仰危机的严峻挑战，必须努力提高文化自觉，包括使命自觉、理论自觉、道路自觉和信仰自觉，它们是一个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和辩证统一的有机的整体。

1. 使命自觉：传承和创新文化是当代中国大学的重大使命

对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而言，它的存在总是与这种社会组织所承担的特定使命密切相关。正是这种社会组织具有某种强烈的使命感，才赋予这种社会组织特有的文化意义和价值系统。由此可见，使命自觉是当代中国大学提高文化自觉的根本前提。

从根本上说，教育和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主要承担着两个方面的任务和使命：一方面，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教育和大学负有开发人的理性和潜力，革新人的天赋，养成健全人格，扩大人的生命内涵，为人的一生奠基的任务；另一方面，对于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来说，教育和大学承担着传承文化和批判地发展知识以更新扩大文化遗产的使命。大学主要承担的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和使命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和辩证统一的，而且具有超越阶级、政

党和一时功利的独立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教育和大学应以“人的发展”为基本目标，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进一步提出了“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重大哲学命题。“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意味着教育和大学应当具有一种着眼于未来的精神，保留其对于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追求。正因为这样，人类至少还可以寄希望于教育和大学，以它来对人和社会的纯功利冲动进行某种平衡。

教育和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主要承担的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和使命，是由教育和大学的本质决定的。教育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有生命的人，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促进人的发展的一种生命活动，文化传承和创新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基础，文化育人是教育本质的核心，“人文化成”是教育活动的本义，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以天下为己任，建设文明、昌盛的社会。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主要通过两条基本途径，一是人的生命的自然繁衍，二是文化的传承创新，从事后一种活动的主体是文化组织，主要代表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由此可见，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这就是我们应当树立的科学的教育和大学本质观，是人们观察和分析一切教育和大学现象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由于高深知识及其构成的学科（专业）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知识基础和大学存在的组织基础，所以，我们应当把传承和创新高深知识作为当代中国大学全面完成时代赋予的重大文化使命的认知基础。但是，必须明确，在传承和创新高深知识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大学还应当自觉地把“守卫文明、立德树人、求真创造、文化引领”作为自己全面完成时代赋予的重大文化使命的核心和灵魂。“守卫文明”，就是在守卫人类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坚持正义、区分善恶、明辨是非和建立信念；“立德树人”，就是通过人文化成“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在“使人成其为‘人’”的基础上以天下为己任，建设文明、昌盛的社会；“求真创造”，就是在“探索未知”和“达至修养”的基础上创造未有的新世界，直接为人类社会谋福祉；“文化引领”就是应当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时代的前头，通过守卫文明、立德树人、求真创造和运用自己拥有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引领社会前进，成为发展人类先进文化的重要基地。这里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大学特有的价值批判和文化选择功能，只有这样，“人类文明”才能守卫，“真正的人”才能养成，“求真创造”才能做到，“文化引领”才能实现，当代中国大学才能全面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大文化使命，成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养成的重

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既服务又引领社会前进。

2. 理论自觉：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文化觉醒与理论创新是紧密相关的，文化觉醒是理论创新的思想基础，理论创新是文化觉醒的重要标志。由此可见，理论自觉，主要是探索和掌握“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是当代中国大学提高文化自觉的主要标志。

第一，大学不仅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学还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主要凝聚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中的大学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形态，是大学物质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和大学制度文化的总和，它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受到教育、办学规律和一定社会文化形态，特别是一定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和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文化形态起反作用，阻碍或推动、引领社会文化发展。因此，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文脉。作为文化底蕴的积淀和大学发展、变革方向的引领，研究大学文化主要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探寻大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

第二，教育、科学和文化是构成大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它们既是不同质的事物又处于同一所大学之中，共同构成了一个以求真育人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教育的本质是通过文化促进人的发展的一种生命活动，“育人为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科学的本质是一种“探求未知”的认知活动，“科学为根”是大学存在的价值基础，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学应当坚守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的核心内涵，基本要求是始终坚守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最富有创造力的学术殿堂的历史地位以及与之相应的以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文化传统。作为大学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文化为魂”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既深深地蕴含在育人为本和科学为根之中，又应深刻反映“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因此，“大学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的核心内涵必然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有一个在坚守中不断实现超越的过程。由此可见，“育人为本，科学为根，文化为魂”是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大学文化是大学人的精神家园，“求真育人”既是大学文化的独特本质，也是大学得以长存于世的独特的和永恒的核心价值。

第三，由于高深知识及其构成的学科（专业）是大学存在的知识和组织基础，因此，作为一种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大学文

化的根基在学术，有其区别于其他类型社会组织独特的组织文化个性，主要是以精神家园和知识权威为传统使命、以文化机制为组织整合和运行的主导机制、具有以“崇尚人文、注重理性、自由独立、追求卓越”为核心的精神传统以及坚守对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追求。但是，必须明确，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精神——大学人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经过历史的文化积淀，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命信念、价值追求、道德准则和思维方式，它渗透在大学存在的一切方面、大学活动的所有领域和大学人的心灵之中，以无形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有形的存在和大学的未来。大学制度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学术价值观，在西方，“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既是一种办学理念也是大学制度的根基。大学物质文化是蕴含在大学存在的物质形态之中的学术、文化内涵。“大学环境文化”是个综合概念，泛指为大学完成治学育人任务营造的自然美、科学美和人文美和谐发展的学术、文化氛围，既以大学物质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和大学制度文化为基础，又是大学物质文化、大学精神文化和大学制度文化的集中表现，其实质是一种“文化生态”。

第四，在当今世界，由于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交融日益深入，促使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以优势学科、精神气质、杰出大师和文化生态为核心要素构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大学核心竞争力之重点所在，包括凝聚力、教育力、创造力和引领力，既是大学赖以生存、发展、办学和承担重大文化使命的根本，也是国家“国际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涵和基础，国家的兴衰与大学的兴衰紧密相关。在当今世界，如果没有众多具有全球意识、较高文化品位和较强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学，就不可能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如果没有一批拥有卓越的和富有活力的大学文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就不可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3. 道路自觉：“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文脉，因此，作为文化底蕴的积淀和大学发展、变革方向的引领，研究大学文化主要是探寻大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根本问题。所以，道路自觉是当代中国大学提高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在对待“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唯西方论”，对西洋教育制度顶礼膜拜，没有很好地承继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其实质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二是“泛政治

化”，把意识形态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没有很好地学习、借鉴人类积淀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出现这两种倾向的认识根源，是混淆了政权更迭与文化变革之间质的区别。“政权更迭”主要解决的是推翻一个旧世界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问题，所以，“从封建走向共和”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然是正确的，而“文化变革”主要解决的是在批判地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价值整合和综合创新的问题，因此，“改造一切旧教育”值得商榷。

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的深入发展，尤其是通过认真回顾总结2000多年来，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和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脉络，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就是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以人为本传承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在承继我国古老的“大学之道”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综合创新”，就是遵循文化选择的本质及其规律，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积淀和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中世纪以来西方近代大学进行理念创新取得的积极成果，全面、科学地认识和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进行价值整合和综合创新，创造出一种既高于自己又超越西方的更加卓越的当代中国大学文化。

无数事实充分证明，发展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必须坚决纠正“唯西方论”和“泛政治化”两种错误倾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发展道路”唯一正确的文化选择。

4. 信仰自觉：“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一种信仰

从本质上说，信仰是对事物发展唯一性真理坚信不疑的认定。由此可见，信仰自觉是当代中国大学提高文化自觉的最高境界，这个坚信不疑的“唯一性真理”有一个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而逐渐认定的过程。

第一，人类曾经长期处在“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社会，在这个漫长的农耕文明社会里，人文学科一直处于社会文化形态的主导地位，当时人们普遍“崇尚人文，鄙视贪欲”，物质生活虽然比较简朴，但精神境界却

是相对充实的。我国自先秦时期以来，一直奉行孔子儒学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立德树人，亲民济世”是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坚守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以“注重发展人的理性”为宗旨的“自由教育”思想，其哲学基础是柏拉图主张的“有理性”是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面对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迅速兴起的严峻挑战，德国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威廉·冯·洪堡顺应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把学术研究功能引入柏林大学，注重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和“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人类从“以人的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社会逐渐向“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社会转型，由于人文学科的非生产性、非营利性和非直接应用性，它在社会文化形态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被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美国大学走出“象牙塔”融入社会之中，在社会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既要积极应对现实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又要坚守大学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学术价值的两难选择，1978年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创造性地提出了“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随之，美国大学成为现代以来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潮流的中心。

第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在物质财富迅速增长和人们生活明显改善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其哲学根源是由于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潮的对立导致的“科学理性”偏离人类社会发展的“人道目标”的价值冲突，其本质是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日益生活在“物质丰富、精神贫乏之中”，成了所谓的“单面人”，忽视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其实质是一种信仰危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当前世界的高等教育和今日的大学，导致大学精神衰微成为当前一个世界性的重要话题，大学组织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和人类社会的知识权威的历史地位正在逐渐蜕变成为技术人才和科技成果的生产基地，以人文关怀和独立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传统正在随着外部各种力量的介入而日趋淡化，人们惊呼“大学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

第四，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从根本上说，大学的存在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理想是实

现和谐，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在人，但是，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人道目标”离不开“科学理性”的强力支撑，应当努力实现“人道目标”与“科学理性”的辩证统一并促使二者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坚信不疑地认定“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是人类社会发展应当遵循的“唯一性真理”，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应当追求的永恒目标，更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

八、大学新的转型正在向我们走来

任何社会思潮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在我国的深入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开始进入哲学视野，2012年4月《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在当代中国应运而生，从大学本质和文化使命、高深学问和文化个性、教育本质和人文化成、探索未知和创造未来、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价值危机和文化觉醒、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以人为本和实现和谐8个方面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体系，是高等教育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进展。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从1978年美国学者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和以“认识论哲学”为主导提出20世纪“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到2012年我国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和以“生命论哲学”为主导提出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是一个质的飞跃，预示着大学新的转型正在向我们走来。

1. 高等教育和大学面临的挑战有了新变化

19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大学走出“象牙塔”逐渐融入社会之中，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积极主动地应对现实社会众多领域不同层次的广泛需求的同时坚守大学应有的基本理性和学术价值，这是1978年布鲁贝克在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20世纪“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的时代背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和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和我国大学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变化为“如何彻底变革教育和大学，以促使目前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价值危机的社会可以超越一味的经济考虑，而注重深层次道德和精神问题”。所以，2012年我国《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深

刻地指出：“所有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把贪欲视作洪水猛兽”，“我国儒家力主‘存天理，灭人欲’，古希腊柏拉图也认为‘有理性’是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但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现代社会发生了变化，日益把人的贪欲视作创造的源泉和进步的动力”，“有些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人的贪欲的理性化释放’，更多的有识之士则把这种现象称为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当前世界的高等教育和今日的大学”。

2. 回归了“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1978年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之所以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和以“认识论哲学”为主导提出20世纪“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在理论上说是他当时仍然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个认知过程”，并把“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作为提出20世纪“使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的客观依据。2004年我国学者张楚廷教授的学术专著《高等教育哲学》对布鲁贝克的上述论据提出了质疑，他从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核心就在“人”的科学论断出发，强调“生命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主要哲学基础，深刻地指出：“生命论哲学不仅涉及教育的本性、基础，而且涉及它的功能，不仅涉及其历史，也涉及今天。”“把高等教育哲学置于认识论基础之上，显然是偏向于用理性主义解释了高等教育本性。”“然而，我们提出了多方面事实，从而多方面阐明了对于高等教育哲学，不能仅仅归结为政治论和认识论那两种基础之上。”2008年我国学者朱人求教授的学术专著《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指出：“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发展，科学理性与人道目标之间发生了冲突，出现了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对立。尤其是一战、二战的爆发把科学技术的负作用充分暴露了出来，科学技术虽然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精神状态的严重颓废和衰落，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危机。”2012年清华大学胡显章教授在为《大学文化哲学——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下称《大学文化哲学》）一书作序时强调指出：“当代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突出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并从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高度来界定文化，把握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2012年我国《大学文化哲学》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和以“生命论哲学”为主导，构建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基本理论框架，是高等教育哲学理念上对“人”在人类

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一种回归。

3. 确认“大学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组织”是理论创新

按照布鲁贝克的观点，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高等学府，并没有深刻揭示大学的文化本质。实际上，从大学诞生之日起，它的本质一直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2007年我国学者睢依凡教授在《大学者，有大学文化之谓也》（载于《大学的使命与泽恩》，睢依凡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曾子在《大学》一文开篇即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之形而上即文化也。无文化之护养，大学何以明德、亲民、至善？无文化之滋润，大学何以能知、止、定、静、安、虑而后得？”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核心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实质是一种道德信仰危机的严峻挑战，在回归“人”在人类社会中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大学文化哲学”的主要贡献是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确认“大学的本质是一种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既相互关联又鼎足而立的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己任的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并且以“大学文化”为逻辑起点和以“生命论哲学”为主导构建了一个以“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为核心的大学文化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为创立中国大学文化学科和探索构建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奠定了新的大学文化哲学基础。

4. “道德信仰危机”呼唤大学认定崇高信仰

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而又极其深刻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1871年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关于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的界定是一种广义的文化观，1946年西班牙学者奥尔加特·加塞特关于“文化是时代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的界定是一种狭义的文化观。面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和我国日益明显地出现的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核心内涵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及其导致的大学精神衰微现象，其实质是道德信仰危机的严峻挑战，2012年4月我国“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作出“大学文化既是一种存在更是一种信仰”的界定。我们之所以以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核心就在“人”的精辟论述为指导，回归“人”在人类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进一

步确认“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坚信不疑地认定“‘以人为本，实现和谐’既是人类社会发展应当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大学应当为之奋斗的崇高信仰”，并以“以人为本，实现和谐”为价值基石探索构建人文理性求实创新和谐的当代中国大学人的精神家园，为实现当代中国大学理想而奋斗，主要是因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是“道德信仰危机”，这正是当前我国大学出现大学精神衰微现象的症结所在。我们坚信，“道德信仰危机”只有依靠并充分发挥“信仰的力量”才有可能得到有效地克服。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一切事物都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着。我国学者张应强教授在《现代大学精神的批判与重建》（载于《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张应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0月）一文中深刻地指出：“自人类开始现代化大业之后，现代化的压力一直迫使大学片面地服务于市场经济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主宰了大学与大学教育，工具主义理性观实现了对大学教育的征服与统治，大学精神急剧退化，价值教育普遍失位。”“我国古代大学以‘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宗旨，将知识、意志、情感及相应各类学问与价值追求统一于人格的全面发展与完善，指向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与此同时，由于封建专制社会和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个人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育。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时，我们首先要用工业文明中的理性和市场经济的自由自主意识来取代依托于传统的小农经济的依附性，走向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主体性。但是，我们又同时面临着个人主体性意识膨胀，特别是个人占有性主体性所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的危机。”“知识经济的崛起、全球化浪潮的涌现、发展竞争的加剧、大众高等教育及其消费时代的来临，使得大学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转型。”

王冀生

农历壬寅（虎年）夏于北京

时代精神与教育观念*

21 世纪将是一个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世纪。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面对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和我国社会转型新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及时转变与时代精神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观念，培养时代所需要的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一代新人。

一、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是进行教育创新的先导

长期以来，在我国教育战线，在教育思想观念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争论，存在着重社会轻个体、重选择轻发展、重功利轻公益和重继承轻创新的倾向，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1. 重社会轻个体

所谓社会本位教育观，主张教育主要决定于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教育活动的主要出发点和归宿，教育适应和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是教育活动的价值所在，这是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教育价值观。但是，一些学者认为，从根本上说，作为“个体”的“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是教育活动永恒的主题，促进“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崇高理想。

2. 重选择轻发展

所谓注重选择教育观，强调教育活动的主要功能是从众多受教育者中选择符合一定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而把多数置于淘汰之列。这种注重选择教育观，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难以避免，问题主要在于导致“应试教育”思想的出现和不合理的教育竞争，忽视促进“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促进发展教育观并不反对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通过教育选拔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但是主张教育活动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每一个受教育者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选拔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 本文是在两篇文章合并的基础上形成的，分别是《上海高教研究》1996 年第 4 期和《高教探索》1997 年第 3 期。

3. 重功利轻公益

应当承认，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教育的功利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社会还不够发达的时候，还是一种非义务性教育，国家发展高等教育是为了培养社会急需的合格人才，学生上大学是为了获取谋生的手段。所谓功利主义教育观，主要是过分地强调了高等教育的“专门性”和“工具性”，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仅有一技之才和会赚钱的工具。但是，从本质看，教育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成其为‘人’”。因此，高等教育的主导方面是“公益性”，它不应当仅仅看到当前的需要，还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4. 重继承轻创新

教育“促进人的发展”是在认知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所谓认识继承教育观主要是过分强调教育的传递功能，忽视教育的文化选择和创新功能。应当说，认知活动是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文化基础，但是，教育活动的灵魂和价值在于“文化的选择和创新”，应当把选择和创新教育贯穿于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能够进行“文化的选择和创新”的人。

二、21 世纪将是一个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世纪

在 21 世纪这个崭新的世纪里，人类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主要是：

1.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20 世纪中叶以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其迅速，呈现出综合化、一体化、人文化和信息化的趋势。现代科学技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高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是日益综合化。当前正在迅速发展的高科技，无论是航天技术，还是信息技术，无一不是综合应用多种学科才能解决的。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追求真理曾经是少数学者的一种“闲逸的好奇”。当今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新时期，其主要特点就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在古代，人们崇尚人文，自然科学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19 世纪初叶以后，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仅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而且人们越来越看到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在改造世界、造福人类方面的巨大作用，于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开始逐步分离，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先进的学者开始认识到，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当代社

会的一切问题，它在为人类社会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众多危机，时代强烈呼唤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融合，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崭新观念。自从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仅仅经过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信息科学技术，特别是微软技术已经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正在全面、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未来。

2. 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了当代的主题，经济发展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国际竞争的内涵转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现在，科学技术在经济、国防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和突出，知识更新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日益加快。”“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发展格局，对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来说，既提供了利用高科技和先进知识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有利机遇，又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3. 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年第一次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在世界各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应用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社会，是人类继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之后将要进入的第三种社会形态。这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新纪元的开始，必将对人类的文化、伦理、理论、观念提出严峻的挑战。它的特征主要是：（1）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产值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经济形态发生质的变革，服务业的比重明显上升；（2）知识既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最重要的消费要素，信息高速网络将成为最重要的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方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3）知识创新将成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先导，社会劳动力的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以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and 知识密集型企业为核心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将是知识生产、传播、应用和创新的骨干；（4）人的智力资源将是最重要的资源，人类社会将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学习将成为个人和组织发展的有效工具，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和终身教育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基础。

4. 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争夺更加深刻

当今的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其实质是文化的开放，其突出表现是多元文化的相互冲撞与融合。无论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还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都在相互冲撞，发生对抗和矛盾，也在相互融合，呈现出勃勃生机。这种多元文化的相互冲撞与融合，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价值观上，必将对现代大学的教师、学生的意识形态产生深刻的影响。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分析

1992年国家决定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它涉及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是对于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探索和建设过程，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等教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关系问题就是一个涉及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全局的、有战略意义的、新的重大理论问题。通过研究，人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将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中，人才和技术资源的源头主要在高等学校。在当今世界，谁争得人才和科技的优势，谁就争得市场，也就争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动权。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and 产生全面的、深刻的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从总体上看，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积极影响是主导的，将会给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以巨大的推动。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大增加对人才的需求，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品质、效益上积极稳步地协调发展，规模将与综合国力的增长相适应，逐步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结构将与产业、技术结构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加匹配，品质将沿着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方向上一个台阶，效益特别是规模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有明显的提高；第二，大大增加对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的需要，促使我国高等学校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力开展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推广和咨询服务，兴办科技产业，使更多的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且组织精干力量承担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发展高新技术，促进相关学科的科研水准和学科建设进入先进行列；第三，要求从根本上改革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集中计划和政府直接管

理的高等教育体制，转换运行机制，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科技、政治体制改革以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相适应的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高等教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第四，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必然会带来人们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将对我国高等学校和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诸如个人价值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创造意识、法制意识等。

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弱点以及目前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健全和人们还不善于处理教育规律同经济规律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还有消极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第一，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和一段时间内，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的出现以及经商浪潮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冲击将会十分强烈，可能导致教育、教学质量面临滑坡的危险，科学研究工作也有可能出现单纯追求“短、平、快”的倾向；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的人才流动是必然的，其趋向是由低价值向高价值方向流动，由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学校与社会上一些部门工资待遇的反差较大，将有可能造成教师队伍的严重不稳，尤其是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将有可能流失过多，令人担忧；第三，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旧的体制要改革，新的体制尚未建立，有可能出现一方面尚未真正做到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而另一方面政府在宏观上又有些失控，使得在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教学秩序可能出现一些混乱现象；第四，在社会上可能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潮以及一些格调不高的消极现象，这些都有可能对我国高等学校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带来消极的影响。

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正在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冲击和影响不仅是全面的、深刻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有积极和消极的二重性。从长远看，从本质看，积极影响是主导的、决定性的，但对其负面影响也不能低估。这些负面影响，有些是市场经济发育尚未健全和人们还不善于处理教育规律同经济规律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暂时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人们新经验的积累将会逐步得到解决。但是，有些则是市场经济固有的弱点引起的，将长期起作用。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冲击和影响的二重性，我们的基本对策是采取“选择性适应”的方针，从而在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把其负面影响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四、时代呼唤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一代新人

21 世纪是一个充满着机遇和挑战的世纪，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面对即将到来的 21 世纪和我国社会正在转型新的机遇和挑战，时代呼唤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一代新人。主要特征是：

第一，富有主体精神

在我国教育界，长期以来，对于教育主要决定于社会发展需要，还是主要决定于人的发展需要，教育的出发点主要是社会需求还是人的需求，是有争论的，争论的实质是教育价值观问题。我国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情况下，我国高等教育实行的是国家集中计划和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统一招生，统一培养，统一分配”，学生上大学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要求大学毕业生应当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服从国家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这是一种社会本位教育观，基本方向是正确的。现在的情况正在起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市场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将在激烈竞争中大大激发其内在活力；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产品不仅要重视引进、消化，更要注意改革、创新，人类生存环境将呈现出多元、多变、多彩、多险的状态，不确定性和可选择性同时加强。时代强烈呼唤着人的主体精神，无论是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还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都要有人，要富有主体精神的人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单位的实际和不断变化的环境正确地结合起来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德智体全面发展与人的个性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符合人才培养、成长的客观规律。在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前提下，突出强调培养大学生的主体精神是时代的呼唤。一个现代大学生，不管他是学习什么专业、学科的，首先应当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明确方向，同时又应是富有个性和主体精神的一代新人。

第二，坚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的统一

教育首先是培养“人”，还是把培养“才”放在首位，在教育发展史上一

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是教育目的问题。自古以来，我国教育就有“立德树人”的优良传统。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认为教育的功能应使人“养成健全的人格”，主张教育应当使人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一直坚持教育工作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强调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着重解决好大学生的政治方向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但是，由于我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中心，社会稳定是前提，所以，反映在教育工作中就比较强调学生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真实本领，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的统一是现代人的基本特征，这应当作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人文精神，泛指做人的基本态度，主要指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他人、人对自我的基本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内涵是具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献身精神，这不仅需要深刻的人文修养，而且要以良好的科学素养作为支撑，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对人文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科学素养，在这里也不单指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学科在内，其内涵也不仅是掌握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分析、解决专门实际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养成一种“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健全的心理。

第三，注重通专结合

大学教育应当注重“通”还是注重“专”，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这里，既有教育思想问题也有教育模式问题。“通”与“专”是个相对的概念，“通才教育”与“专门教育”是个历史的范畴。19世纪以前是历史上“博雅教育”的时代，17世纪教育理论家夸美纽斯提出“泛智论”和“学习一切”的口号，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狄德罗主张对学生进行“百科全书式的教育”，19世纪初叶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把“博雅教育”定义为“文理兼备的普通教育”。19世纪初叶工业革命兴起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学科门类不断增多，工业社会日益趋向严密的专业化和分工的方向发展，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逐步走向分离，形成了“隔行如隔山”的现象，于是“专门教育”应运而生。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出现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要求理工结合和文理渗透，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开始由以分析为主向以综合为主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步认识到，高等教育不仅应当注重培养专门知识、技能、能力的“专业教育”，而且应当加强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综合素质为宗旨的“通识教育”。这种“通专结合”教育观的提出，主

要是反映出一种对人的文化、素质、人格的完整性追求。这主要是由于当代社会面临巨大的挑战，迫切要求大幅度提高人类自身的质量，创造新的教育，以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一代新人。面对世纪之交的严峻挑战，主要适应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上的“两个根本转变”和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通专结合”将是 21 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四，以选择和创新为己任

大学教育重在继承还是重在选择和创新，是关于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人才价值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通过个体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促进个体身心发展，使个体社会化，并最终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这里有三层意思：教育的基础是文化的传递；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类社会得到延续和发展；教育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是通过促进个体身心发展，使个体社会化实现的。由此可见，教育与社会、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统一在文化的传递上。必须明确，高等教育虽然具有教育的共同本质，也是以文化的传递作为基础的，但是，高等教育不是一般的文化传递，而是高深知识的传递，而且高等教育应当在传递人类已有高深知识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高深知识的选择和创新上，这恰恰是高等教育的价值所在。应当承认，与经济、政治相比，高等教育与人类文化具有潜在的和更加深层次的本质联系，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的联系往往是通过人类文化作为中介的，文化在教育与经济、政治之间起着重要的沟通和桥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等教育主要是通过培养大学生发挥的对文化的传递、选择和创新作用来为社会服务的。面对世纪之交的严峻挑战，当前我国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我国高等教育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文化的选择和创新上，着重培养大学生正确识别、选择和创新文化的能力，这既是教育规律决定的，更是时代的强烈要求。

当今社会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浩如烟海，二是多元化。如何在浩如烟海和多元化的文化中正确地选择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正确把握住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光荣任务，也是时代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急剧变化”是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创造力”已经成为人们适应社会急剧变化的一种“生存能力”。在这样新的时代背景下，从继承性教育转变为创造性教育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载于《上海高教研究》1996 年第 4 期和《高教探索》1997 年第 3 期）